

主体、内容与媒介： 全球传播中的价值博弈与悖论

高冉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借助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全球传播活动的体量和频率大幅增加,而其所牵涉的伦理价值悖论亦愈发凸显,其中,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新闻真实与国家利益、互联网中立性与平台垄断,分别在传播的主体、内容、媒介三个维度上构成了当下全球传播中最重要的价值对立。因而,本研究具体论述了全球传播中:国家、个人、安全、隐私四个要素的价值博弈模型;假新闻的传播机制和牵涉的价值;由平台数据垄断而形成的“平台主义”,导致传媒生态原有的“权—责—利”平衡被打破,其与透明原则的悖论引发的传媒伦理问题。最终,信息近用权的保障、复杂性研究的突破、对新闻真实的正确认识、重视平台媒体用户并通过制度手段确保其平等的参与地位,将是解决当下全球传播伦理问题的纾困之道。

关键词:全球传播;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新闻真实;互联网中立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4-0050-10

全球传播问题首先是传播的问题,而对于传播的相关问题,我们必须时刻认识到:传播是一种符号活动,其过程包括对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传播是一个互动过程,它发生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传播的意图并不是传播的必要条件,也即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任何传播活动都涵盖内容维度和关系维度,传播者会将特定的关系结构强加在传播的互动过程中。^[1]因此,不仅新闻记者不可能完全跳出由特定文化所形成的价值网络来展开传播活动,其他人也不能例外。

一、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张力

在社会、国际、全球层面,许多侧重点不尽相同的伦理困境及现象,往往可以归结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这一本质。在谈论隐私与安全的相关问题时,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相互博弈,时常遭到回避。

(一) 新闻公共性与个人隐私的冲突边界

在社会层面,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二者之间需要维持平衡。哲学家们区分出了两种价值观: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和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工具价值在于它可以带来其他的价值,而内在价值本身就是价值所在。隐私具备工具价值的属性,因其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而将隐私称作是核心价值的表达方式,则是随着时间发展、为了强调隐私重要性而发展出来的概念。^[2]笔者对隐私权的理解,是当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信仰、理念、行为、生命、财富、关系等等)时,各主体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产生了不允许其他主体知情的信息,这种性质的信息就是隐私。大部分人都会假定,个人隐私中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公共利益,因此媒体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不能被合理化。然而,阿卡德(David Archard)却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了反对这一主张的论证。^[3]其反对的原因在于,从公众福祉角度所极力鼓吹的隐私权,到底是否曾被侵犯,其实是极为不确定的。例如,八

卦新闻藉由某种道德规约与禁令的规范强度，可以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显示一定的意义。揭露一些个人的异常性行为不仅对其本身是有益的，同时更指出两性事务不应被导向该行为模式。同时，对权贵人士私生活的揭露，使神秘感不会被滥用。这种对其神秘感的解除作用，能够强化人们的平等观念。而若想挑战阿卡德的论证，就必须指出公共利益与公众所感兴趣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隔。但正如阿卡德所说，如果二者存在关联，那么媒体对公众名流的关心在道德上就可以被视为正当，即便人们能合法地指责这种侵犯，此种侵犯也仍会被视为一种特例。

新闻工作者和公众对于“知情权”（right to know）“知情需要”（need to know）和“知情欲望”（want to know）这些概念存在普遍的混淆，正如秘密和隐私容易被混淆一样。“知情权”作为法律术语，常常与公开法令相联系，建立在政府信息公开运作会更加诚实的哲学基础上，是平衡政府权力的一种形式。新闻工作者和公众都合法地拥有知情权。虽然有关知情权的法律规定，并非伦理范畴，但即便已经知情，出于新闻伦理道德，新闻工作者也不能将其合法知情的信息全部刊登，例如警方报告中所记载的犯罪嫌疑人、受害者和目击者的姓名等。“知情需要”来自于哲学领域。媒介伦理学者德尼·埃利奥特（Deni Elliott）认为，大众媒介应该提供可以让公民投入日常生活的信息，而不论其政治观点为何。^[4]为公众提供需要知道的信息，被包括在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坚韧品质的要求和所应当肩负的责任之中。例如，审计员和政府可以检查财政机构的记录，普通公民却无法做到。但进行个人经济方面的明智决策，却需要获取这些机构的运行状况，以及有关管理者的品格等信息。而对于这类报道来说，法律并不一定是信息近用的工具。^[5]因此，“知情需要”在上述三个近似概念中最具有伦理强制性，它要求把他人希望保持隐秘的信息公之于众。而“知情欲望”涉及大众的好奇心，在伦理上最不具有强制性。比如邻居最近的活动、他人的薪酬、娱乐界的花边新闻等，我们并不真的需要这些消息，也无权要求了解，而仅仅是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于职业特性的缘故，新闻工作者往往掌握大量迎合“知情欲望”的信息，一些媒介甚至就建立在公众对名流、罪犯以及普通人的知情欲望基础上。隐私的概念愈发能够迎合这种欲望。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职业伦理问题：新闻事业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是否会让新闻工作者更加难以完成他们的重要工作？^{[4]（137-138, 140）}

（二）风险社会与新的全球安全问题

在国际层面，随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转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指的是不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广泛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征。其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问题；冰岛的性别安全问题；俄罗斯的能源安全问题；非洲国家的食品安全和粮食短缺问题。当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普遍化的时候，呈现出的是公共问题，例如空气污染，而等到非传统安全问题普遍化，压倒其他社会、政治等问题进而成为国家需要首先解决的棘手问题时，就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例如雾霾。^[6]有学者提出，^[7]当前国际伦理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蕴涵于中国的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当中，即仁者爱人的和合主义、互帮互助的关系主义、共享中庸的孔子主义（confucianism）。

在全球层面，随着风险议题的全球化，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形成。全球风险社会的关注焦点从20世纪40年代核能扩散问题转移到当今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以及恐怖主义风险。“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一核心概念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8]的《风险社会》出版且被译成英文，而得以广泛传播，逐渐成为解释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范式。其在信息与传播领域的体现为：传播议题的全球化。^[9]风险社会的产生，实质上还与更早些时候的“新干涉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国际关系范式的实践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很大反响，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是“互不干涉内

①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政”。冷战之后，这一原则受到了更大的挑战，“新干涉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兴起，主要指人道主义干涉，即在捍卫人权、民主等价值观的旗帜下对别国内政与外交的干涉。^{[9] (76-85)}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相对，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因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公开提倡而广为人知。由于二战和冷战的到来，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国家间的主要行为再次成为权力争夺，自由主义风头不再。冷战之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 1977 年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为新自由主义奠基。相互依赖的国际机制、全球化与国际治理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但同时也带来了全球规模的系统性风险，流行疾病的全球扩散便是一个明证。

（三）四个要素的博弈模型

全世界有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和各种宗教。^[10] 在笔者对全球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伦理进行的分析研究中，^[11] 发现除了一些共有的特征得到凸显之外，不同国家地区的规范性文本之间的矛盾分歧也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南苏丹对于公开信源的坚持，相关文本的主张是：无论具体情形如何，一定要公开信源。而其他的多数文本则是支持一定限度内的信源公开，绝大多数的文本都主张信源保护（不公开）。因此，最大的争执来自于信源保护（source protection）、透明度或近用权之间的争端。更进一步，在这一显性争端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同主体和要素之间的权益争端，即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争端。

如果我们将国家、个人、安全、隐私这四个要素拆分开来，就会发现，既存在国家层面的安全、情报争端，也存在个人层面的安全、隐私争端。同样，在隐私层面上，国家、个人之间存在权力博弈；在安全层面上，国家、个人二者之间依然存在这种博弈冲突。更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上，国际社会中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安全、情报对立的隐忧，尤其是在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巨大之时（可参考 2019 年中美贸易纠纷的具体相关内容）；在个人层面亦然。在安全层面上，有国家、个人安全对立的隐忧，尤其是国家内部存在强劲反对国家当权者的个人力量时（可参考 2018 年 10 月失踪的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事件）；在隐私层面上亦然，例如国家不可能随时随地开放国家核心机密给任意公民，公民也有权不把个人信息交给任意宣称代表国家权力的个人或机构。前者由于关系到国家机密而易于理解，后者主要表现在公民隐私保护方面，即公民向上申诉的行政监督权力和相关司法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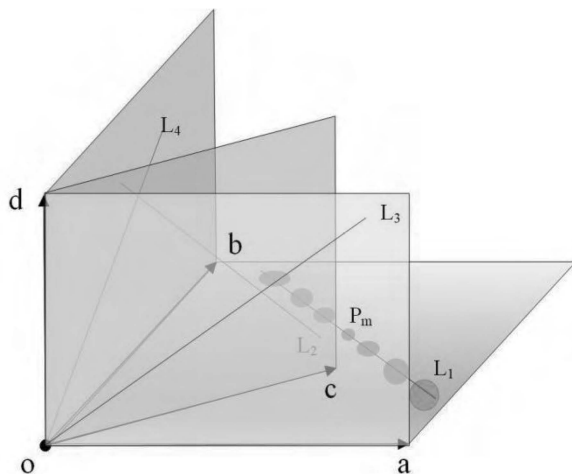


图 1 主体要素博弈示意图

因此，如图 1 所示，安全、隐私、国家、个人这四个主体要素的强弱便可以用空间中的四个矢量来表示。于是， \vec{oa} 是表示国家权力的向量， \vec{ob} 表示个人权力， \vec{oc} 表示隐私程度， \vec{od} 表示安全程度， \vec{oa} 、 \vec{ob} 和

\vec{od} 构成了一个空间三维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平面 aob 与平面 cod 正交于直线 oc，直线 L_1 、 L_2 、 L_3 、 L_4 分别位于平面 aob、cod、aod、bod 上， P_m 是位于直线 L_1 上的一系列大小不等的点。直线 L_1 、 L_2 、 L_3 、 L_4 分别表示其所在给定平面内，两个相关变量的关系，即正相关或负相关。可以看出， L_1 和 L_2 表示了变量分别在 \vec{oa} 、 \vec{ob} 和 \vec{oc} 、 \vec{od} 向度上的负相关性，而 L_3 和 L_4 体现了变量分别在 \vec{oa} 、 \vec{od} 和 \vec{ob} 、 \vec{od} 向度上的正相关性。 P_m 表示 \vec{oc} 作用在平面 aob 上产生的影响，影响幅度体现在点的大小上，这是由于维度限制，因而此处所使用的二维平面实际上描述了四维向量的相互关系。图中， \vec{oa} 与 \vec{ob} 可互换位置， \vec{oc} 与 \vec{od} 也可互换位置，平面 aob 与平面 cod 亦可互换位置。

总之，国家与个人之间、安全与隐私之间的张力造成了这两组矛盾关系，而社会生活的复杂网络使得这两组关系所涉及的四个主体要素在互动中此消彼长、交叉变化。上述只是论述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变动关系，而要缓和甚至解决这两组矛盾冲突，则可能需要借助复杂性研究的进一步成果。

二、新闻真实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新闻真实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是虚无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若是公信力丧失，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都将成为虚无。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国际新闻的真实性是国际媒体公信力的核心与根本。在现实的科技人文条件下，多重新闻来源比对、交叉检验的可能性增多、便捷性增强，检验那些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传播不真实、不客观的新闻的国际媒体就会在全球新闻媒体市场上逐渐丧失媒体公信力。而如果国家主导的媒体在全球缺乏公信力，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该国的全球传播能力，并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国际新闻真实性与国家利益存在如图 2 所示的链状关系。



图 2 国际新闻真实性与国家利益

（一）假新闻的价值牵涉

欧洲学者在 2017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在过去的 15 年中，“假新闻”这一词汇被用来指称：讽刺新闻、滑稽新闻、事实捏造、新闻操纵、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12] 假新闻中包含的信息，一般可以分为：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由于失误导致的信息谬误会产生错误信息，被歪曲篡改或罔顾事实的信息是虚假信息，而含有恶意的信息曝光就是恶意信息。同时，新闻摄影图片也可能会歪曲事实。造成新闻摄影多重标准的原因，是存在一个假设前提：艺术可以被操纵，但信息不可以。^[13] 于是，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假设：一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摄影记者让照片更令人愉悦的意图，不在于欺骗；二是目标受众有能力识别“美化”与“欺骗”的差异；三是受众成员并不会因为这种差异，而产生原本不会产生的想法或行为。^{[4] (224)} 新闻事件的制造者，新闻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者都可能对假新闻的扩散起到重要作用。

假新闻在国际战争中层出不穷。在战争时期，国际新闻报道中最早“阵亡”的，便是真相。例如，俄国的政客、记者和作家经常引用“杜勒斯计划”（俄文：План Даллеса 或 Доктрина Даллеса）来揭示冷战结束前后俄国社会中弥漫的假新闻背后的阴谋。该计划的目的是在俄国人民中达到如下结果：（1）对国家荣誉的漠不关心；（2）对自由的利己式理解；（3）对异见的极不容忍；（4）对谎言的大度。^[14] 许多哲学家提出，撒谎是获得并保持权力的一种方法，为了防止恐慌和保护国家安全，而在危急关头向大众、或者向敌人撒谎，是其中的两例，而新闻工作者常常积极主动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

欺骗。^{[4](33)} 为了有益于社会而向公众撒谎,就如同不告知绝症患者其真正的病情一样,属于道德困境。另外,新闻工作者应该说多少真相,是另一个道德问题。然而,完整、准确、真实、客观,这些概念之间都存在着重要的道德差别。

在哲学层面,假新闻还牵涉到还原论。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也被称为化约论,主张复杂的系统、事物和现象可以被化解为各部分的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作为西方哲学认识客观世界的主流观念,还原论认为通过将所有事物分割成部分的途径,可以了解万物的本质。与此相对,源自东方文明的整体观认为上述观念仅是相对于简单事物的认识论,而对于复杂的事物,例如生命体,一旦被分割,就会导致信息丧失而使事物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越高,被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策划若是登峰造极,便会制造出运用媒介效应提前规划好的“假事件”(pseudo-event)。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最早探讨了假事件,即为了被报道的直接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事件。^[15] 而这类纪念报道通常都折射了某种特殊的历史观:(1)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将自己视为历史上所有自由与开明篇章的合法继承人,否认其历史中所有的不自由和蒙昧的段落;(2)过度强调西方文明在科学、财富和民主上的优越性,并将其描绘为不可阻挡的进步和前后相继的历程;(3)不断弱化欧洲在亚非拉扩张过程中的阴暗面,并将其建构成没有后果的孤立事件;(4)将边缘国家无条件地整合到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中,将其呈现为唯一正当的选择。而大多数新闻都是经过精心策划才生成的产物,因此,边缘文化中的新闻媒体由于难以契合上述新闻生产的工作步骤,而被遗落在了黑暗中。不知不觉中,全球媒体几乎都在不断鼓吹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史。^{[1](126-131)}

(二) 国家利益限度与国际新闻操纵

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诠释,体现了杰出的政治家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历史上,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就大相径庭。梅特涅认为对国际秩序的谋求有利于国家利益,他认为秩序是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而不单是对国际利益的追逐,“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而俾斯麦则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量国家利益,他不认为有什么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出于功利主义的权衡与决策,他认为只有准确评估权力的各构成要素,才可确保安全,“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16] 可以说,放眼国际秩序,俾斯麦和梅特涅恰好分别划出了国家利益的底线和上线。他们二人对于国家利益的审视与考量,对于当代的世界局势而言,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利昂·西格尔(Leon Sigal)^[17]曾指出,新闻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而是据说曾发生过,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事。新闻记者很少现场目击事件的发生,因此不得不依赖其他人对事件的讲述。而无论读者是公民还是官员,都倾向于忽视“新闻并不等于现实”这个事实。新闻只是从描绘现实的消息来源(sources)中抽取了一部分,然后又经过了新闻机构作为中介的加工。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要求对可能的信息来源进行抽样。因而,无论媒体采用何种程序,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内容的选择产生影响。对于发表出来的影像,人们往往认为其中一定具有某种因果关联,原因在于:影像记录往往被视为证据;观看遗迹的心理在发生作用。^{[3](129,137)}而那些强势媒介(电视、互联网),虽然并不是信息失实或道德

缺位的独有媒介，但却因其强大，而使得媒介共有的缺陷被极端放大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素材实施大规模把关，且不同层级的新闻人之间存在选择的重复性，因而把关作用对新闻进行了形塑。即便不出于刻意，社会心理学与群体动力学都曾运用实验证实了相似情况下的一系列信息歪曲（serial distortion）。就如同一个“传话游戏”，当一个人将一则模棱两可的消息耳语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再用同样的方法把消息传递下去，最后这则消息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且越来越接近参与者的偏见和预期。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美国传媒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总结出了不确切信息的几种传播过程：（1）削平（leveling）不相容内容；（2）磨尖（sharpening）一致成分；（3）同化（assimilation）既存观点。这些过程相互叠加，深化了对他者的疏离，增强了对熟悉的人事物的认可，特别是当新闻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时。

新闻记者彼此之间作为首要的参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既具备群体思维，也共享集体荣誉感。^{[1] (81-91)} 群体思维使得“媒体私刑”（media lynchings）与“跟风新闻”等现象频频出现，而集体荣誉感让新闻从业者捍卫彼此的特权（prerogatives），包括保持消息来源匿名、驳回诽谤诉讼等，并一致反击外界的批评。同时，职业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特定的心理框架，即特定的“认知、阐释与呈现，选择、强调与排斥的模式”。这种框架的存在让记者能按照常规迅速处理大量信息，并将有用信息分配到特定的认知范畴，再将其包装好传递给受众。新闻人常常宣称其工作中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但这种宣称却恰好是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关键因素。这种职业意识形态和框架被表述为“新闻采写技术”（techniques of news gathering），即通过强调一系列的方法，例如搜集额外证据、展示冲突、归因等，由记者编制出一张事实网络（web of facticity），其中包含了客观性策略的许多惯例（strategic rituals of objectivity）。因此，新闻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无偏见或绝对真实，而是体现在完成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程序与修辞中。有些修辞关系到新闻要素的“真实性”，例如事件、地点、人物和对象，而另一些被批评为“数字游戏”的新闻数字罗列，则是为了体现新闻的“精确性”。此外，借助于匿名报道，例如仅署名为“某某通讯社”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就可以规避新闻事实报道的偶然性。消息来源可能会被隐匿，而被引述的内容则不一定被完整或公正地呈现。即便媒体将信息来源标示清楚，也可能是为了引导公众将责任归位到信息来源身上，况且媒体还可以对信息来源的身份运用贴标签的方法，来为引述定调，包括政治信仰标签（political conviction labels）、政治角色标签（political roles labels）以及性别标签（gender），从而激起受众的回应。^{[1] (107-111)} 而对于处在从事实到观点连续体的不同位置上的评论文章，新闻媒体则会为作者署名甚至刊登其照片。电视报道在这些方面更甚，可能混杂了新旧材料、混淆“真实发生”的与排演的事件。所以，对于众所周知的“议程设置”机制，倘若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将特定议题放到全球媒体的议程上，那么该国就可能对国际舆论形成巨大影响，因而很可能会操纵议题。^[18]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19] 世界上的新闻媒体用来捕鱼的网是一个相当精巧的装置。

新闻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往往从纯粹的民族国家视角出发。挪威研究者概括出了对新闻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1）事件的时间跨度（time-span）较短，通常在几日之内，跨度太长就不会被当作新闻；（2）事件的规模（scale）和强度要突破一定的阈值才会被报道；（3）事件的清晰度越高，越容易被媒体关注；（4）事件的文化接近性和相关性越高，重要程度就越高；（5）事件的发生与人们的期望越具备一致性（consonance），就越会被报道；（6）事件的不可预见性（unexpectedness）与稀缺性会影响事件的新闻价值（news values），即便是大众期望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可能有出人意料的方面；（7）事件被报道之后往往具备延续性（continuity），会被追踪报道，即便其新闻性已经缩水；（8）待发新闻的构成（composition）与不同新闻类型的平衡会影响到新闻最终的发布；（9）事件是否牵涉精英国家（elite nations）；（10）事件是否牵涉精英人士（elite persons）；（11）新闻媒体倾向于报道个人或特

定人群，因为他们更具体，更能引起同情或厌恶；（12）新闻的负面性（negativity）越高，越是好新闻。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方媒体个人化、倾向于负面报道、追逐权贵、猎奇的特点。因而，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努力抵消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个人化和负面性做出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他们认为，事件应该展示出更大规模的群体，以及其中蕴含的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利益与观点，而国际新闻报道常常忽视这一点。此外，负面性使得贫穷国家的发展、取得的实质性成就被忽视，地方团体的工作、数亿人日复一日的劳作，以及其中展现出的勇气、活力、创造性、团结的精神都没有得到媒体足够的关注。而且，对负面事件的强调，使得多数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国家看起来总是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无力解决任何问题并取得成就。^{[1](30-34)} 20 世纪末，有学者统计过国际新闻的数量，发现由占世界人口 1/3 的发达国家流向占世界人口 2/3 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是反向流动的新闻数量的 100 倍。^{[1](132)}

（三）意识形态与价值的普适性

在当代国家利益中，国家安全和国家话语权无疑占据首要位置。而学者们几乎都认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核心。对于意识形态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李金铨曾指出：“国际新闻的生产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而意识形态的定义与内涵则较为多元。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第一次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并指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科学，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则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因为意识形态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列宁（俄文：Ленин）不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并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及所有集体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则主张，意识形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加之于大众，从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权利表达方式。

普世价值的概念来源于译自拉丁文的“oecumenical value”和“universal value”。前者起源于基督教会普世教会运动，之后又衍生出普世主义，用来指称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教义统一运动；后者从哲学和心理学出发，指人类对自身价值最基本的评判标准。根据汤一介的看法，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中，都存在“普世价值”因素。有的学者质疑，西方价值（values）究竟是真的具有普适性，还是西方历史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崛起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吉内肯（Jaap Van Ginneken）总结了西方价值的内涵，并将其归结到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方式、意识形态这五个方面：（1）经济价值：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2）社会价值：个人主义与社会流动；（3）政治价值：务实主义与中庸节制；（4）生活方式价值：物质主义、自主性；（5）意识形态价值：没有意识形态。^{[1](61-63)} 然而，对于普世价值，人们尚有许多刻板印象。其片面认知主要包括：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普世价值的传播主体应该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普世价值的传播主要是政治传播；普世价值是“普适”的，其内涵不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三、互联网中立性悖论

传播者带有偏向性的价值最终在被有机地制度化后，纳入传媒业的管理体系。不言而喻，附着传媒控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生活方式和政治价值的信息传播活动，自然不可能完全依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只是其自身的社会属性都被隐藏在了客观性的修辞之中。^{[1](64)} 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传播活动中立性原则的主张显得缺乏现实逻辑。即便是目前在全球仍然占据话语支配地位的西方传媒机构，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其伦理规范的首要表征便是“政治正确”和市场驱动（前者因应西方社会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后者，多少有点像吉内肯所描述的，“谁出钱，谁点戏”^{[1](33)}）。尤其是当这些机构的主张，

与意识形态较之相左、社会或经济发展水平与之不同的国家发生舆论认知冲突时，信息中立性原则更是消失殆尽。尽管互联网中立性面临如此悖论，但在技术层面，有关网络中立性的思考一直是现在进行时。

（一）信息近用权利是争议的根本

互联网的中立性是指互联网上的信息应该被平等对待的原则。2015年，在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内，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颁布了“开放互联网命令”（Open Internet Order），以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两年后（2017年12月），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任上，同一机构宣布部分撤销这一网络治理性质的文件内容。^[20]然而，美国二十余个州却随即宣布在各自州内保留网络中立性原则^①，互联网行业协会和许多民间组织也纷纷反对废止《互联网中立性法令》，呼吁网民积极争取互联网市民权和线上言论自由。我们发现，这场表面看似关乎互联网“已经死亡”或“更加自由”的论争，本质上却是“网络或信息近用”权利的博弈，^[21]尽管其中不乏商业利益向度和传媒伦理向度的较量。

在网络传播实践中，作为法律、技术、社会规范相互博弈的结果，互联网信息管控过滤行为^[22]成为相对于信息近用权（access to information）的有效概念。人们对于互联网信息规制的认识在21世纪的最初2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溯互联网发展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美相关的专利和文献内容^[23]几乎都与如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技术规制有关。^[24]这或可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控制论思想的延续。^[25]当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创立的控制论使得信息作为一种“可能性”被接受，而这种接受，与消息内容的真假或其美学意义均无甚关联。作为人类生产的社会成果，机器智能不可以为其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没有情感，甚至把数学图表都统统放入了黑箱。^{[25] (92)}控制论的诞生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博弈的时代背景，即信息急速膨胀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管理技术的被迫革新密切相关。然而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社会伦理层面上，信息近用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信息过滤规制，成为全球性传媒规范的核心关切。^[26]

（二）透明性成为唯一被保留的原则

值得学界注意的是，在美国，互联网中立性原则存废之争的同时，与信息近用权相仿的理念——信息透明，近年来得到了保留和发展。对于“透明”的追求乃至其发展为一种文化，源头在于比今天的电子文化甚至印刷文化都更为古老的前印刷文化，“抄本文化和哥特式建筑都关心光的通透，而非光的照耀”^[27]。而今，美国“开放互联网命令”中唯一没有争议并被保留下来的正是“透明原则”（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他们阻止或放缓信息流的时间和具体情况，以及他们提供的付费优先服务进行披露）。^[28]有所沿袭并有所突破是人类社会在错综交叠中演进的规律。在互联网最初的非歧视性原则变得岌岌可危之时，信息透明、网络近用成为一种要求对信息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利用的新追求。

（三）平台主义所引发的问题

在互联网传播实践中，技术主义的新高度孕育出了“平台主义”（vectorialisme）^[29]，即由计算工业与传媒工业的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笔者的这种观点在一些法国学者的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30]

平台主义将搜索引擎转化为媒体，也即成为具备物理设施、掌握网络内容、拥有广告收入的“平台”，例如百度、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由于在信息市场上具备了卖方寡头垄断的地位^[31]，这些“平台型媒体”开始扮演认证、健康、教育领域的监管者的角色，且在支付领域对银行、在通信领域对电话造成冲击。由于信息、数据在用户和这种新的“媒体”（vecteur）之间不对称性的加

① 包括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蒙大纳州等。

剧,在资本的作用下,平台主义使得用户愈发处于从属的地位,并使公共权力受到质疑。所以,这种隐含着网络行动者极强获利意图的平台主义行为倾向,实质上是一种对从属关系的再分配。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面临新的矛盾:互联网平台型媒体为企业和公民提供了新的所谓的民主工具,对原有的民主制度,甚至对民族国家秩序形成挑战。^[31]因此,互联网巨头对用户信息有意或无意的滥用问题,例如2018年剑桥分析公司通过脸书(Facebook)滥用超过5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不会单纯因为企业隐私条款的完善或各利益相关方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而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个人信息的滥用,并不完全是由于隐私保护缺失,其根本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化的“平台型媒体”在传媒市场上迅速攫取的新强势垄断地位。这使得传媒生态原有的“权—责—利”平衡被打破了,换言之,这种“滥用”现象折射的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尖锐的传媒伦理问题。近来,伴随着“美团天价罚款”等反垄断的举措,以及“国家反垄断局”等机构的建立,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对境内平台主义的蔓延进行应对。

四、结 论

在全球传播活动中,作为传播主体的国家和个人,在产学研政军各方力量参与的过程中,都面临安全与隐私问题的攻防博弈。在传播内容层面,国际新闻的真实性将对国家利益造成影响。而由互联网中立性悖论造成的平台主义,使平台型媒体在新的信息革命推动下迅速获得了数据资源的垄断地位。

对于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若要对其进行彻底解决,一是要从保障媒介信息近用权和透明性原则上入手,逐步协调矛盾关系;二是要对多重变量进行系统分析,在复杂性研究中对其进行突破。

此外,国际新闻的真实性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链状关系,最终影响该国的全球传播能力,以及国家利益,因此不应将两者错误对立。假新闻包括: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在具体的传播实务和理论背景中,假新闻的传播还牵涉到战时状况、还原论、媒介假事件。同时,不确切信息的传播模式加剧了假新闻的散播。在国际新闻的制作过程中,传媒工作者的群体思维和媒介间议程设置也发挥着潜在却巨大的作用。然而,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具体所指在认识论上并不具备普遍共识,至少在概念认知上存在认知跨度较大的底线与上线。而对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意识形态价值及其普适性的认识,也存在诸多误区与对立。

最后,互联网中立性悖论本质上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对信息近用权的争夺,当然也牵涉到网络媒介的信息负载传输能力(affordability)。在这个博弈场上,参与者既有网络服务提供商、监管者,又有内容提供商、用户,且各自被制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所规训。其中,用户由于其小散乱弱的特点而最具脆弱性,因此应该在社会伦理层面上获得足够的关注,从而取得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谓“无知之幕后应有的平等地位,而不仅仅是被当作一份份文件和数据,被机器和算法所记录、分析和传输。

参考文献:

- [1] [荷]雅普·梵·吉内肯.理解国际新闻——批判性导论[M].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6-10+71.
- [2] [美]乔尔·鲁蒂诺,[美]安东尼·格雷博什.媒体与信息伦理学[M].霍政欣,罗赞,陈莉,曹海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6-279.
- [3] [英]马修·基兰.媒体伦理[M].张培伦,郑佳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
- [4] [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M].李青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7-138+140.
- [5] 何生根.信息近用权:数字鸿沟的解决之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20(A07).

- [6] 余潇枫. 和合主义：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因素 [D].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稿，2019.
- [7] 余潇枫，章雅荻. 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7）：49-76+156-157.
- [8] 王银瓶. 亨利·詹姆斯与三种思想文化思潮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62.
- [9] 任孟山. 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95-98.
- [10] 蔡亮. 试析国际秩序的转型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树立 [J]. 国际关系研究，2008（5）：25-38.
- [11] Gao, R. (2020). The new focus of global media ethics – Information access. In Zhang, Y. & Chistyakova, O. (eds.). *Proceedings of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Philosophy of Being Human as the Cor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CCESSH 2020)*, Moscow: Atlantis Press, 145-149.
- [12] Wardle, C. & Derakhshan, H.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 [13] Martin, E. (1991). On photographic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6 (3): 156-163.
- [14] [俄] 谢尔盖·鲍里斯耶维奇·尼科诺夫. 国际新闻的地缘政治视角 [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611 会议室-汉奇苑，教师学术沙龙，2019.
- [15] Boorstin, D. J. (1964).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um.
- [16] [美] 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 [M]. 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85-86.
- [17]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18] Knightley, P. (1975). *The first casualty: 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propagandist, and myth maker 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 London: Deutsch.
- [19] [美] 塔奇曼. 做新闻 [M]. 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
- [20] Reardon, M. Net neutrality has been dead for a year: What you need to know. Retrieved June 11, 2019, from <https://www.cnet.com/news/net-neutrality-is-now-really-officially-dead-open-internet-congress-now-what>.
- [21] Roberts, M. E. (2018).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2] Akl, S. G. & Taylor, P. D. (1983). Cryptographic solution to a problem of access control in a hierarchy.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TOCS)*, 1 (3): 239-248.
- [23] Gupta, A. K. (2003). *U. S. Patent No. 6, 516, 315*. Washington: U. 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 [24] Maigret, É. (2015). *Sociologie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s médias*. Paris: Armand Colin.
- [25] Deibert, R., Palfrey, J., Rohozinski, R. & Zittrain, J. (2009). Book Review –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52 (4): 413-414.
- [26]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192.
- [27] 高冉. 互联网治理：中立性的博弈与牵涉 [J]. 情报杂志，2019（12）：60-65.
- [28] 定义“平台主义”（法文：vectorialisme）的尝试，见于：Hervé, L. C. (2008). Tentative de définition du vectorialisme, In Broudoux, E. & Chartron, G. (dir.). *Traitements et pratiques documentaires: Vers un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Actes de la deuxième conférence Document numérique et Société*, Paris: éd. ADBS, 133-152.
- [29] Le Crosnier, H. (2014). Internet et numérique. In CNRS Éditions (eds.). *Le XXe siècle saisi par la communication*. Paris: Hermès, La Revue 3, 25-33.
- [30] Maigret, É. (2015). *Sociologie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s médias*. Paris: Armand Colin.
- [31] Gidzinski, W. Did Facebook just declare war on the Nation State? Retrieved March 6, 2017, from <https://wojtekgidzinski.com/facebook-just-declare-war-nation-state>.

[责任编辑：高辛凡]